

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

卡尔·考茨基著

(供内部参考)



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

卡尔·考茨基著

馬清槐譯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請核对原文，并
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K. Kautsky

TERRORISM AND COMMUNISM

A Contribution to the Natural History of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W. H. Kerridge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London, 1920

根据倫敦乔治·艾伦和恩文公司一九二〇年版轉譯。原著以德文出版。原著名称是 Terrorismus und Kommunismus. 柏林 Verlag Neues Vaterland 1919 年出版。

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

〔德〕卡尔·考茨基著

馬清槐譯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資料室編印

一九六三年六月（一） 定价（七）0.80 元

印数 0,001—2,000

出版者說明

《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是考茨基在一九一八年为攻击列宁和列宁主义而写的一本书，一九一九年六月写成发表。这本书实际上是考茨基一九一八年发表的《无产阶级专政》一书的續篇。早在一九一七年，列宁就在《国家与革命》中对考茨基的机会主义論点进行詳尽的揭露。一九一八年十月，列宁为批判考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写了《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但是，考茨基完全不理列宁的批評，紧接着又写了这本小册子。写作这本书的目的，据考茨基自己說，是要“討論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对布尔什維克方法的态度”。他采用了《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书名，妄图把它作为“声討”布尔什維克“罪行”的“檄文”，以此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一九一九年九月，当列宁看到考茨基《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出版消息时，立即写了《资产阶级如何利用叛徒》一文（《列宁全集》第三十卷），无情地揭露了考茨基直接为资产阶级效劳的真面目。

全书共八章，前七章是考茨基对法国十八世紀以来历次革命运动所謂恐怖主义所作的“历史考察”，說什么“正統的馬克思主义”是历来反对恐怖主义的，而布尔什維克正是犯了“殘酷恐怖主义”的罪行，认为“只有一味訴諸暴力的雅各宾的恐怖主义，才和布尔什維克有着某种继承的关系”。

考茨基在这部分历史說教中，甚至不惜歪曲历史，直接曲解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的言論。

在一些章节里，考茨基还打着“历史唯物論”的幌子，发表了一系列的謬論。他“探討”所謂“恐怖主义的淵源”說，在早期社会，农业居民是定居的，所以习尚和平，讲究人道；而畜牧业、商业是流动的，所以牧民和商人慣于掠夺，崇尚殘暴。到了資本主义社会，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两种傾向，商业资产阶级傾向殘暴，工业资产阶级則傾向和平。认为在法国大革命以后，所有革命都摒棄了恐怖主义，这表明十九世紀人道主义傾向的发展，但是进入二十世紀，布

尔什維克又違反了这种傾向，这是“历史的倒退”。

如果說在前七章考茨基还作了一些“引經据典”的工作来为自己的謬論辯解，在第八章他已找不出任何論据而只能进行誣蔑和咒罵了。在考茨基的笔下，苏維埃政权被描繪成漆黑一团。

对布尔什維克的攻击，考茨基首先是从“分析”所謂“时代的特点”談起的。他說，“我們看到一个世界正在沉淪于經濟破产和自相殘杀之中”，“无产階級中最缺少修养的分子”，“被放到运动的最前列”，所謂苏維埃，只不过是“純粹独裁和专断統治的基础”。指責布尔什維克迷信暴力，“把單純的权力”看作是“世界上的决定因素”，誣蔑布尔什維克开展的“用赤卫队进攻資本”的运动，即“剝夺剝夺者”的斗争是“彻头彻尾的反馬克思主义”的“暴力論”，說什么布尔什維克“不会考虑实际的局势”，不懂得什么是“社会化”政策。据考茨基說，剝夺資本必須和經濟改組一起进行，而布尔什維克却把两者“一分为二”，“截然分开”。指責布尔什維克放手发动农民、沒收地主土地、征用富农粮食是犯了“走上劫富济貧的俠盜式道路”的錯誤，詆毀領導农民起来斗争是布尔什維克听任群众“自由行动”，說什么已經把“剝夺的过程从对于生产資料的剝夺扩展到对于消費資料的剝夺”，“很容易走上搶劫的道路”。

布尔什維克的肃反政策，也是考茨基攻击的目标。他說，“枪毙——是共产党政府的全部智慧”，“它們具有专断的权力，可以宣告任何被控到它那里去的人的罪名，随意决定枪毙那些不受欢迎的人”。在“‘反革命’这个集合詞下，把各种各样的反对者都包括了进去，不問这是发生在哪一类人中間，产生的动机是什么，用的是什么手段，抱的是什么目的”。

考茨基把布尔什維克实行的“不劳动不得食”的原则，誣蔑成苏維埃政权在面临經濟破产前强行的“强迫劳动”，“实际上是要把現在的資產階級变成一个新的奴隶階級”。

考茨基还搜集了不少“材料”，攻击布尔什維克貪污腐化、蜕化变质；批評布尔什維克虐待知識阶层；斥責布尔什維克“控制报纸”，侵犯“出版自由”，以宗教裁判所的态度，以絕對独裁的形式，强制群众絕對服从；責难布尔什維克败坏无产階級道德，如此等等。一句話，在考茨基看来，布尔什維克是十恶不赦的罪魁，苏維

埃制度是“革命的驢武主义”，俄国成了“兵营社会主义”。

考茨基由此得出結論說，这“证明俄国在革命爆发的时候，时机并未成熟，不宜立即实行社会主义”，布尔什維克“已經牺牲了自己的原則，表明自己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他們虽然在俄国取得了胜利，但“社会主义則已經遭到了一次失敗”。他喋喋不休地一再誣蔑苏維埃政权是所謂軍事官僚机构，說布尔什維克“一开始就决心要摧毁現成的国家机器，以及它的一切軍事和官僚机构，然而他們在解决了这个問題之后，发现他們自己不得不为了自保而重新建立同样的机构”。这个机构的統治者是“把一切实际的和事实上的控制权都抓在自己手里”的“新官僚階級”。在这个国家里，“資本主义正在复活，但它所采取的形式对于无产階級來說，是比旧的形式更加暴虐和更加有害的”。說什么“現在政府和資本家的官僚体系已經合并成为一个体系。这就是布尔什維克所推行的社会主义大变革的最后結果”。这个政权眼下虽然没有垮台，也只能“苟延殘喘”，因为“像旧的資本主义一样，这个新的‘共产主义’已經自行产生了它自己的‘掘墓人’”。叛徒考茨基就是这样来咒罵无产階級专政的。

考茨基在书的結尾还談到了世界革命的問題，极力抵制布尔什維克在国际无产階級中的影响，离間各国社会主义者的团結，妄图說服他們脱离布尔什維克世界革命的路綫。他把布尔什維克对形形色色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說成是“自相殘杀”，是“兄弟鬩牆”。說“布尔什維克从一开始就是党派紛爭的产物”，“照俄国人看来，世界革命宣傳者的主要任务是在全世界无产階級群众中掀起一場自相殘杀的战争”。考茨基提出他自己的一套世界革命的路綫說：世界革命实现的道路“不会按照独裁的路綫，也不会利用大炮和机枪，也不会通过消灭自己的政治和社会的敌人，而只会通过民主制度和人道主义”。說什么“民主制度是賴以实现較高生活方式的唯一方法，也是社会主义所說的文明人的权利”，民主制度“为西欧和美国的社会主义提供远为美好的远景”，等等。最后考茨基还把矛头指向第三国际的成立，认为第三国际对社会民主党宣揚资产階級民主的批判是极端錯誤的，叫嚷“沒有一种說法比这更为錯誤的了”。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革命与恐怖	3
第二章 巴黎	5
第三章 大革命	12
第四章 第一巴黎公社	18
巴黎无产阶级及其斗争的方法	18
恐怖统治的起源	21
恐怖主义的失败	26
第五章 恐怖统治的传统	35
第六章 第二巴黎公社	43
公社的起源	43
工人代表会议和中央委员会	53
巴黎公社中的雅各宾派	58
国际工人协会和巴黎公社	61
公社的社会主义	70
中央集权和联邦制度	77
公社的恐怖主义思想	84
第七章 文明对于人类风俗习惯的影响	92
残暴与人道	92
两种倾向	97

杀戮和恐怖手段	101
十九世紀行为的倾向仁义	106
战争的影响	112
第八章 共产党人的活动	119
剥夺和组织工作	119
无产阶级的发展	129
独裁	137
贪污腐化	141
布尔什维主义的改变	149
恐怖	156
苏维埃共和国的前途	160
世界革命的前途	166
译名对照表	175

序 言

这本著作是大約一年以前动手写的，但由于十一月九日的革命而中断了；因为革命給我带来了不屬於純粹理論和历史研究范围的新的任务。过了几个月，我才能够繼續动笔，在偶然間断的情况下把这本书写完。

最近局势的发展并没有增加这部著作的完整性。这一点所以比較难办，是由于随着时间的进展，对于这个論題的研討多少有些改变。我的出发点是討論現代社会主义的中心問題、即社会民主党对布尔什維克的方法抱什么态度。可是，既然布尔什維主义自动提到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认为巴黎公社在某种程度上是它的先驅和雛型，认为巴黎公社已經得到馬克思本人的贊許，同时鉴于現在这一代人还不大認識和了解巴黎公社的真实情况，我就把巴黎公社和苏維埃共和国作了对比。

为了使讀者能对公社有所了解，我不得不論及巴黎公社，以后又論及法国革命及其恐怖时代。这給了我从另一个角度来比較苏維埃共和国的新的方法；因此研討公社之后就必然要进一步研討恐怖主义、它的起源和它的后果。

这样，本书就由两条思想路綫合并而成，但其中的一条又間或离开了另外的一条。起初，我觉得这个办法多少有一点叫人发生混乱，甚至考虑到是否还是把这本书分成两个不同的部分，一部分闡述巴黎公社，另一部分討論恐怖主义。然而，就我的出发点而論，苏維埃共和国同历史上的这两件大事密切相关，在我看来似乎不可能分別加以論述。因此我希望，虽然存在着本书的二重性所固

有的困难，我終於能够保全书中所包含的思想的結構的完整性。

讀者可能认为我的許多例证和解釋是學究式的，但無論如何，它們都有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特別是在目前这种紛扰动乱的时候。这并不是說我仿佛已經使历史上的真情实况适合于当前的需要了。相反地，甚至在我論述一个过去的遙远时期的那些段落里，我也經常力求只討論問題的似乎有助于闡明我們周圍的混乱局面的那一个方面。

只要我們注意一下現今存在于俄国和德国的这种混乱局面，我們当前的形势和我們的前途就一定是很不可乐观了。我們看到一个世界正在沉淪于經濟破产和自相殘杀之中。在这两个国家，我們发现政府下面的社会主义者作出不利于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行动，其殘酷的程度与半个多世紀以前屠杀巴黎公社成員的凡尔賽劊子手們的暴行没有什么不同，而那种暴行是一向引起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值得称道的憤慨的。

但是，当我们考虑到国际的时候，前途就立刻显得比較光明了。西欧的工人們已經起来。唯有他們才能取得实际的成績，如果他們采取的方法比东方至今所采用的方法来得高尚的話。

因此他們有必要向我們吸取經驗，知道怎样凭成效来認識不同的斗争方法和建設方法。这倒并不是盲目地恭維那些直到現在为止占相当优势的革命方法，而毋宁說是提出必要的、尤其在目前必要的最严格的批評，因为在目前这个时候，革命和各社会主义政党正在經歷一个十分严重的危机，各种不同的方法都想在这危机中力爭上風。

革命的成功将大部分取决于它是否能发现正确的方法来把革命的使命传达給无产阶级。研究各种方法是我們目前最崇高的职责。本书的目的就在于帮助这种研究，从而促进革命的向前发展。

卡尔·考茨基

1919年6月于夏洛騰堡

第一章 革命与恐怖

在世界大战爆发以前，社会民主党最广泛的范围内流行着这样的想法：不仅对于西欧，而且对于德、奥两国来说，掀起革命的时期早已过去了。无论是谁，只要他抱有不同的想法，就被嘲笑为革命的空想家。

现在我们碰到了革命，这次革命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狂暴的姿态，是连平时设想得最出奇的革命空想家都料想不到的。

对于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废除死刑是一种十分明白的要求。可是，这次革命却已带来了由一些社会主义政府实行的最残忍的恐怖手段。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是始作俑者，因而受到了一切不同意布尔什维克观点的人们的最严厉的谴责。其中就有德国多数派社会党人。但是，在这些社会党人采取了作为东方革命特征的由恐怖统治实施的同样的手段以前，他们并不感到自己的权力遭受威胁。诺斯克已经冒失地仿效托洛茨基的榜样，当然其间还有这点不同，即他本人并不认为他的专政是无产阶级的专政。但是这两个人都以革命的权利为理由来为他们的屠杀作辩解。

事实上，认为恐怖手段是革命的一种要素，以及谁要革命谁就应当设法向恐怖手段作某种让步等想法，是流传很广的。作为这一说法的证据，人们一再援引法国大革命的例子。它被看作是出色的革命。

要探讨恐怖主义及其种种情况与后果，最好是从叙述无套裤党所建立的恐怖统治入手。我们将从这方面开始。这会把我们带回到离当代事件相当遥远的时代，但我们在考察过去以后就会更

清楚地理解当前的事件。发现在法国大革命和当代的那些革命、特别是俄国革命之间有多少相似之处，肯定是会引起人们的注意的。

然而当代的那些革命在许多基本的方面与十八世纪的革命有所不同。如果把我们的无产阶级、我们的工商业同那个时期相应的现象比较一下，这一点就立刻可以看出来。

第二章 巴黎

目前的德国革命沒有中心，而法国大革命却受巴黎方面的控制。如果不考虑巴黎对整个法国在經濟和政治上所佔的重要地位，那次革命以及在革命中間发生影响的恐怖統治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在十八世紀甚或十九世紀，沒有一个城市行使过像巴黎在那个时期所行使的权力。这是作为中央政府的王室所在地在一个近代官僚政治中央集权国家中佔有重要地位的結果，只要近代工业資本主义和运输工具的发展随着带来的經濟上的地方分权还没有开始，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在一个封建国家中，它的中央机关和它的君主的权力实际上是很有限的。它的职权范围并不很大，其相应的一般政府机构也是如此。这个机构可以很容易地从一个城市或所在地迁移到另一个城市或所在地。只要运输系統还处在不发达的状态，只要个别的地区不足以供养君主和他的家臣，君主就往往格外不得不采用这个办法。所以，他有更迫切的动机要亲自巡視他的領土的各个地区，因为这是他可以指望借此維持他們的忠誠和服从的唯一手段。因此在那初期，君主的主要工作是像一个游牧民那样从一处走到另一处，逐一地寻找水草丰盛的牧場，在耗尽了它的可用的东西以后立即舍之而去。

可是，随着時間的推移，特别是由于生产发展的結果，政府机构有了扩展，而生产的发展就使货币制度成为可能，并可强制臣民以容易运带的硬币而不是以笨重的自然产物向君主納貢。随着納貢义务的增加，君主的权力也有所扩大，以官僚政治和常备軍的形

式出現的政府机构也是如此。这样，向各地流动的情况就成为不可能了。君主和政府必須設在某一个固定的地方。从前单独的大城市既然位居王国的中心并比外省的較小的城市为富，就成了商业輻輳之所。它們就終于成为君主选作駐在地点的首府，后来其中又有一个特殊的城市被选为政府和君主的永久駐在地。这里立刻便聚集起一切与政府有关的人們，全国的税收都送到这个地方来，其中只有一部分会流回到外地去。为宫廷和政府服务的商人都在这里成家立业，还有那些以銀行家的身分来同国家做交易的金融業者。

与此同时，君主的权力超过了貴族的权力，后者的独立性立刻被摧毀了。大貴族願意安居在远离国王駐所的自己的庄园里，对于他們的行动君主是不能忍受的。他們應該在君主的亲自监督之下呆在宫廷里，專門为君主服务，而这种服务是毫无益处和好处的真正的服务。君主剥夺了他們的管理公共事务的独立的职能，把它們交給他所任命的并給与薪給的官僚与官吏。朝臣逐漸变成了懶汉，他們一生的唯一义务就是呆在宫廷里，乱花从自己的产业上得来的收入。因此，当年他們在自己的城堡和城寨里同家臣們一起消費的东西，立即流进了宫廷所在的城市并增加了它的財富。在那城市里，他們在国王的王宮的旁边建造了新的邸宅；他們既然被剝夺了一切正經的职务，就花天酒地地揮霍他們的財產。同他們一起嶄露头角的資本主义的“暴发戶”竭力模仿他們的行动。

因此，与乡間各地和“外省城市”大有不同的王室所在地就不仅成为全国財富的中心，而且也成为追欢寻乐的生活的中心。这对乡間的一些人而事实上是許多局外人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因为他們不是有錢过享乐的生活，便是具有帮助寻欢作乐的人获得欢乐从而可以騙取他們的錢財的意願和本領。

可是，比較严肃的人也被吸引到宫廷所在的城市里来。住在偏远庄园里的貴族除吃喝、打猎和同邻近的姑娘作乐以外，沒有其他的消遣，城市却开始采用了比較精美的生活方式和娱乐。貴族开始表现出对艺术的兴趣，贊助科学的精神立刻成为“一时風

尚”。因而艺术家和学者不久便聚集到宫廷所在地来，他們希望在那里更快地获得进步。宫廷所在的城市里中产階級的人数越是增多，艺术家和作家就越来越多地聚集到那里，希望紧靠着貴族找到一个立足点和一个銷售作品的市場。由此显然可以看出，許多实业家和商人是为了滿足所有这些人的要求和需要而被吸引到那个地方去的。没有什么地方比宫廷所在的城市更能提供发迹的机会了。凡是有才智、自信和精力的人都聚集到那里去。

然而并非每一个人都能达到他的目的。有很多失败的事例，那些失败的人形成了首府的另一特征。他們就是那些力求在首府改善自己地位的成群的流氓无产階級，因为只有在首府他們才能很好地躲藏起来，等待他們可以立即加以利用的运气的轉变。他們是像里科·德·拉·馬尔蒂尼埃这样的人。不但是艺术和科学，而且还有放纵的追欢寻乐，連同最辛酸的貧困和屢見不鮮的罪行，成为皇家首府的另一特色。

与特殊的社会地位相应的，是一种使居民精神活跃起来的特殊的心理状态。但是，在每一个宫廷所在地，情况并不完全一样。数量往往让位于质量。

在一个小国里，或者在一个經濟上落后的社会里，宫廷所在的城市很小，上述的特征有許多是不存在的。在这种城市里，最显著的特征是居民的依存于宫廷，并且这种依存性不仅是經濟上和政治上的，而且还是精神上的。朝臣的心理状态变得更加粗暴、更加鄙俗和更加天真，并在从首都获得启发的外省居民中間反映出来。

这是日耳曼民族具有濃厚的君主和奴隶色彩的心理状态以及与之俱来的“地方观念”的根源。这是在資產階級民主兴起时使其先驅居于最显著地位的心理状态。它使得不顾一切的波納宣布：“其他的民族都是奴僕。日耳曼人是受人服侍的”——这样一种思想由海涅更睥睨不可一世地表达了出来：“德意志这一虔誠儿童的养育所，并不是羅馬杀人犯的巢窟。”

但是，在一个宫廷所在的大城市里，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是不

一样的。城市愈大，被吸引到宫廷去的人们同那些力求在城里发迹的其余的居民比起来，其人数和势力愈小。希望破灭的和不满意的人愈多，他们就愈加团结一致，并且他们的力量也愈大。这种局面并不单单鼓励了那些人；它也激起了这样一些人的反对，这些人虽然就个人来说并没有不满的理由，却清楚地认识到国家和社会所遭受的损害。这种反对到处都很流行。在較小的城市里它处于潜伏状态，在較大的城市里它就敢表现出来。

在十七和十八世紀大陸上的宫廷所在地中間，最大的是巴黎，它是欧洲当时最重要的国家的首都，在十八世紀末約有居民六十万。魏馬是德意志的宫廷所在地和精神中心，約有居民一万人。

巴黎的居民很早就表现了他們的反抗精神。因此就发生了一六四八年的福隆台党的叛乱，这次叛乱是政府和作为最高法院的巴黎議會之間的冲突引起的。当时筑了許多街垒；直到最后国王不得不逃离巴黎。这是一六四九年的事，在这同一年，英国的查理一世走上了断头台。斗争一直持續到一六五二年，这一年君主政治不得不达成某种協議，但这种協議不久便导致专制制度的复活。首都居民已在斗争中同高等貴族团结起来，这就形成了一个不平等的联合。高等貴族在反对君主政治的斗争中任何行动都无法获得胜利。巴黎所具有的反对路易的力量，与倫敦所具有的反对查理的力量不同。

当路易十四还是青年的时候，福隆台党的斗争就发生了。巴黎市民的起义和他的逃亡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不再經受同样的屈辱，他在巴黎城外建立了王宮。当然，他不得不抛下政府机构；但他选择一个离开巴黎极近的地点作为他的宫廷的固定所在地，以保证同他的王宮有一种經常而迅速的联系，然而又有相当的距离，不致受任何街头騷乱的侵扰。一六七二年，要使他或者毋宁說是他的人民花費百万法郎的新宮在离巴黎十二哩的凡尔赛开始兴建。在未来的几百年中，它屡次证明它是不顾巴黎的反抗者而被建造起来的。

虽然巴黎往往坚决起来反对国家的中央权力，它对那个权力的态度却并不总是带有统一行动的特征。另一方面，它努力争取独立和脱离国家权力的支配，但是它的财富与权力却取决于帝国的幅员和帝国国家权力的实力。它努力争取它那社会的自治权利，但它从国家的中央集权获得更大的好处，因而它本身为了自己的生存是赞成中央集权的。

由于巴黎对帝国的其他一切部分占据突出的地位，它在十八世纪的期间才能把法国各个征服的省份在全国紧密一致的气氛下团结起来。如果不是这样，怎能使亚尔萨斯人同布列塔尼人或法兰德斯人同加斯科尼人团结起来呢？但是他们都和巴黎有关系。他们的最优秀的儿子都在巴黎，在那里合并成为一个单一的和统一的民族。巴黎一方面是国家中央集权的最坚强的拥护者，同时另一方面又是它的最激烈的反对者，这一事实所引起的矛盾心理在巴黎对外省的态度上反映了出来。在巴黎，帝国正在遭受其打击的弊害很快地被揭露了。巴黎比其他任何城市更有勇气来揭露和谴责它们。它很快就获得了向它们进攻的力量。因此它成为苦难中的全部法国的领袖。外省的人民由于散居各处，在知识上是落后的，并且精神颓丧、软弱无力。他们把巴黎看作是自己的先驱、自己的救星，往往十分热情地仿效巴黎所作出的榜样。

但并非始终如此。因为，巴黎这个城市不仅由于它的居民的劳动，而且由于对外省的剥削，已经变得很强大；那种剥削的结果是使外省制造的货物绝大部分流进了巴黎，其中一部分被浪费掉，一部分被用来积累资本，并使国内的剥削者与投机商人得以发财致富和巩固他们的地位。因此，除信赖进步的巴黎以外，还产生了把巴黎看作一个剥削的都市的那种真正的仇恨，从而出现了首都和外省的对立。根据历史的事实来看，有时是一方、有时是另一方占了上风。

由于社会环境不同而产生的不同观点的结果，经济上的对立变得格外显著。在广大的乡村和外省，经济显然处于停滞状态。